

贰 信仰之变

妻子病逝、事业失败的双重打击

大中华纱厂的创办,标志着聂家经济的发达和聂云台企业活动的高峰,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民族纺织资本发展的顶点。但顶峰的风光过后,掩藏着巨大的危机。

20世纪20年代,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,大部分西方国家百废待兴。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,人民深受其苦,加上水灾、旱灾频发,人民苦不堪言。刚结束战争的西方各国急待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拯救本国企业,外国资本气势汹汹卷土重来,华资棉纺织业遭受重创,聂云台也未能幸免,其经营的各企业大多遭受巨大损失。家族企业恒丰纱厂负债60万两银元,中美贸易公司损失30—40万两,中国铁工厂差点被债权人拍卖,号称“模范纱厂”的大中华纱厂于1922年开始正式经营时就已面临全面危机,最终因不胜债务负担于1924年以150万两的低价出售。

聂云台心中的苦闷并没有枕边人可以诉说。聂云台18岁时娶妻江西太和萧氏,婚后夫妻感情甚笃,很快就有了孩子聂光堃,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然而,萧氏身体气血虚弱,无法言语,视力受

损,于1917年离开人世。

遭遇到妻子病逝、事业失败等人生危机,聂云台开始寻求一种新的精神寄托。

崇拜托尔斯泰和甘地

聂云台曾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。他的英文老师是在中国呆了三十多年的著名英国传教士、学者傅兰雅。对聂云台加入基督教产生影响的还有托尔斯泰。聂云台自言平生最崇拜两人,一为托尔斯泰,一为甘地,以至于给自己取了一别号“托庐”。聂云台认为托尔斯泰的著作彰显了平等和博爱的精神,并把宗教与西方先进的科技联系起来,因而他坚信基督教对于救国救民有益。

聂云台35岁时受洗入教,成为真正的基督徒,并把追求财富视为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和荣耀上帝的重要手段。不过,对于如何使用和支配财富,他并没有完全遵循基督教所提倡的俭朴生活和节俭精神。这从聂云台在上海的寓所就能窥视一二。著名的“聂家花园”包括1幢独立别墅、5幢红砖洋楼以及一些附属建筑,中间还有曲径通幽的花园,聂家子弟健身用的网球场等。

聂家外孙女张心漪曾回忆这个花园:“外婆家永远是

一座美丽的迷宫,那里有曲折的小径,可跑汽车的大道,仅容一人通过的石板桥,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,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,由暖气养着玫瑰、茉莉、菊花、素心兰的玻璃花房,小孩子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,放着炭熨斗和缝衣机的裁缝间……”

仁者以财发身,不仁者以身发财

在事业全面失败的1924年,聂云台皈依佛教,吃斋念佛,闭门思过,后从高僧印光法师受五戒,从一名基督徒成为一名佛教徒。这种变化不仅与其事业家庭的挫折促使其寻找新的精神寄托有关,深究起来,也是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的折射。聂家既以曾文正公儒家思想传家,又含有佛教信仰的成分。父母供观世音菩萨,朔望必礼,家有疾病危难之事也必祈祷菩萨,这对聂云台有很深的影响。当时,近代佛教复兴潮流兴起,对上海实业界颇有影响,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实业家信奉或倾向佛教。作为近代上海实业界的风云人物,聂云台在事业受挫之时皈依佛教成为顺理成章之事。

皈依佛教之后,聂云台

对宗教、人生、社会、世界都有了重新认识,在财富观方面也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哪怕是最细微的饭粒聂云台都要计较,而家里的西式浴缸、冲水马桶也都拆掉。大出丧在旧时的上海十分常见,一日之间,花费一二十万银元更是随便,举办者还以此为荣耀。“这是极大的浪费,而且可能出于卑劣自私的心理。”

聂云台认为,中国应该在消费上厉行节俭,特别是纸烟洋酒、糖果海味、化妆品等奢侈品,节俭能减少国家财产流向国外,国家财政窘境可以缓解,百姓赋税可以减轻,而国民经济终可进入良性发展轨道。

1942年,聂云台撰成《保富法》一书,刊登于上海《申报》,劝人散财布施,救济灾民。数日之间,收到献金四十余万银元。

聂云台强调“仁者以财发身,不仁者以身发财”的处事原则,即是仁者会将财富用在利他的公益上面,教会子孙行善,子孙自然会发达;不仁者只会将财富堆积在自家,久而久之子孙只会花钱。他将自己的私财及妻子萧氏夫人遗留的财产、金饰等全部捐了出去,自己早晚两餐喝白粥一碗,中午仅食粗粮。



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中国馆全景。聂云台以“中国游美实业团”副团长身份出席博览会并考察了美国的纺织工业。



1936年,柏林街头迎接中国体育代表团。一年前,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便开始为柏林奥运会选拔队员。聂云台正是中华体育协进会8位筹备委员之一。

叁 修身齐家治国

聂氏家庭集益会

晚年的聂云台,组织发起了聂氏家庭集益会。

每个周日下午2点半,聂家各房兄弟亲友汇聚于辽阳路崇德堂宅,与会者一般在二三十人,对于家事,大家踊跃探讨做出具体规划,并积极设施;对于家庭教育,各位明定宗旨,并给予切实指导。

聂氏家庭集益会既是商谈家族重要事宜的家庭集会,又是家庭教育会,并创有《聂氏家言旬刊》一书。近代报刊权威戈公振在为《家声》(《聂氏家言旬刊》前身)所做的“序”中说,《家声》乃“聂氏一姓之定期刊物”,宗旨在“联络家庭之情感,而切磋其道义”,这一形式更是“在吾国为创见,即在欧美新闻事业发达之国,亦未之前闻”。

或者,只有设身处地回到这样的历史现场,我们才会依稀体会到传统中国“修身—齐家”何以能与“治国—平天下”的理想构成一种内在的理路一致性。

事实上,聂云台早已与众多当时的近代企业家一样,担当社会职责,干预公共

事务,走到了时代的前列。

蔡元培将其与陈嘉庚、吴锦堂称为全国“办学三贤”

1913年的一天,聂云台来到上海公共租界东区,与外国小孩的良好家教不同,此地的华人子弟根本无钱上学。当年,聂云台就捐赠7亩土地并向工部局报备筹办学堂,提出要进行商业职业教育,特别要传授簿记技术;要传授手工业技术,诸如木工等。1915年,该校建成并定名为聂中丞华童公学,其学费是近代上海地区最低的,家境贫寒的学生还能减免学费。

1914年,黄炎培和蔡元培等教育界领袖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,迅速得到聂云台、张謇等人的热心相助。除了捐献巨资以办学,聂云台更参与具体的组织活动中。

作为复旦大学校董,聂云台捐赠《四部丛刊》一套,约2100册,这形成复旦大学图书馆雏形;作为东南大学校董,聂云台向社会募捐16万元,帮助东南大学建立了

图书馆;他还促进东南大学和暨南大学在上海设立商科大学,凡此种种,皆是聂云台“教育救国”思想的重要实践。蔡元培将其与陈嘉庚、吴锦堂称为全国“办学三贤”。

年轻人“应当避开这些低级的感官接触为最重要事”

除了对教育事业的关心,聂云台也多次在公众场合强调体育的重要性。他早已把人民身体素质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强弱的高度,“世界强国,其人民无不虎虎有生气”。

1924年5月,各地区体育联合会代表倡议正式组织“中华体育联合会”,聂云台等人组成章程起草委员会。同年8月,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,聂云台当选董事。该会虽说是一个代表国家的民众体育团,却加入了国际体育组织,开展了国际体育竞赛活动。

聂云台在德国考察实业的过程中曾了解到,不洁身自好的人尤其是学生害花柳病的甚多,这不仅影响个人身体健康,还影响社会文明

的进步。新文化运动以来,主张全盘西化的弊端日益暴露,上海社会受到性解放思潮的影响,也已日渐堕落,世风日下。1946年,聂云台在杂志上一针见血地指出,这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青少年及未来。他说,“今天所谓的物质学者、新文化家,主张全盘接受欧美文化,都是对于客观的事实,没有能够潜心地观察,也是由于自身的嗜好欲望大多,失却了他们冷静的头脑。”聂云台希望人们能够不为现代娱乐活动麻痹精神,抵制低级的欲望,尤其是年轻人“应当避开这些低级的感官接触为最重要事”。

1943年,聂云台因骨结核病截去了半条腿,不良于行,更不外出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聂云台短暂复出主持恒丰纱厂的产权收回和经营等工作,但实际上只挂一董事虚衔。1953年12月,聂云台于上海病逝,终年73岁。

据王佳龙《聂云台政宗研究》、秦燕春《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》等整理。

文/三湘华声全媒体
记者 王铭俊

链接

聂云台《保富法》节选

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:“现在社会的人,左手进了一百万元,右手布施了一二元,就称为是大慈善家。”由此可知这种行为,是世界的通病。总而言之,保富的方法,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,也就是要有过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。

表里如一,即是诚意、毋自欺,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;如果无此根本,一切政治的路,都是行不通的。

互动

您还知道哪些有关湖南近代实业家的故事,您有哪些关于他们的线索与资料,都欢迎联系本报《都市周末》编辑部,0731-84329424等待您的来电。